

谈谈犯错误问题

李 山
东

B023

21



2 017 3793 2

谈谈犯错误问题

李茂堂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济南

谈谈犯错误问题

李茂堂 著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印张 39千字

1982年1月第1版 198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

书号 3099·701 定价 0.15 元

前 言

犯错误，这对革命者来说是一件多么不愉快的事啊！人们在工作、生产和日常生活中，总是希望一帆风顺，万事随心，使自己的思想经常地、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然而，按照辩证法行进的历史，却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不论什么人，从他能够对周围事物作出判断的时候开始，就必须在正确与错误、成功与失败的反复比较中认识真理，在不断总结经验、纠正错误的过程中改造世界。人们通往真理的道路是曲折前进的。多少人为了探求革命真理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多少人为了自己犯错误而大伤脑筋，又有多少人为了纠正自己或别人的错误而耗费着大量的精力！

为了弄清犯错误的问题，在历史上曾有不少人以非常严肃的态度进行过探讨。但是，历史和人类的认识史是逐步发展的。由于当时人们的认识运动还没有积累起可以作出科学结论的材料，由于这些人受到自己世界观的局限，他们到头来或则求之于上帝，迷信于鬼神，归结于天命，跌进唯心主义的泥坑；或则孤立地去考察犯错误的某种原因和后果，不能全面地、历史地分析问题，犯了形而上学的毛病。他们的认识往往是肤浅的，甚至是完全荒谬的。直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人们凭借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才能对犯错误的问题有了比较全面、

深入和比较切合实际的理解。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正确评价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正确评价了建国三十二年来党在工作中的功过是非。这不但对于统一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思想，同心同德建设四化，有着伟大的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对待犯错误的问题，也有非常重大的指导意义。现在，我们的党和国家处在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新的历史时期，举国上下，万众一心，正在热烈响应六中全会的伟大号召，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以攀登泰山、征服“十八盘”的英雄气概，为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在这样的新形势下，认真研究一下有关犯错误的问题，从历史经验中尽可能多地学到一点东西，力求少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特别是力求不在重大问题上犯带有原则性的错误，这对于我们的伟大事业，对于我们每一个革命者，都是十分必要的。基于这种心情，作者在学习《决议》的过程中，就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犯错误问题，写了一点心得，以期对同志们研究这个问题时能起点抛砖引玉的作用。和这本小册子中所论述的一样，由于作者理论水平不高，经验不够，在论述犯错误问题时产生新的错误，这是非常可能的，望读者多加批评指正。

作者

一九八一年九月

目 录

前言

《决议》给我们的启示	1
人为什么会犯错误?	13
犯了错误必须认错改错	26
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	37
要善于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	46

《决议》给我们的启示

正确认识和对待犯错误的问题，这对我们总结经验，做好工作，增强团结，保证革命事业兴旺发达，是至关重要的。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们在研究犯错误的问题上，引起了很大的兴趣。许多同志都在思考着、谈论着：象毛泽东同志这样的伟大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还会犯错误呢？我们应当怎样正确地认识和对待犯错误的问题呢？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回顾了党的六十年的战斗历程，总结了建国以来三十二年党的基本经验，正确地评价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分析了这些事件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以及这些事件所以产生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科学地阐明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指明了我们前进的方向。《决议》极其明确、极其充分地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和世界人民解放事业的历史贡献，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指出和分析了毛泽东同志的缺点错误，对他伟大一生的功过作出了客观的、全面的、公正的评价。这对于我们认清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勋，更好地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清三十二年来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统一全党思想，团结各族人民，实现

新时期的历史任务，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决议》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评价，再一次使我们认识到这样一个真理，人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出现缺点错误是难以避免的。正象列车在轨道上飞速向前奔跑会出现一些颠簸，“用兵如神”的将军也可能打几次败仗一样。无论什么人，在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在他改造世界的实践中，不可能没有主观不符合客观的情况，不会没有一点错误。这一点，连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包括那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不能例外的。

毛泽东同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毛泽东同志的最大的功绩，是他在同我们党内的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成功地结合起来，总结和创造了一系列新鲜经验，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欧洲产生，二十世纪初期首先在经济比较落后的俄国取得胜利的。要在一个国家，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一项极其伟大而艰难的任务。革命过程中所遇到的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靠照套外国革命的现成公式，是不可能解决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进入了崭新的阶段，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少人

由于理论准备不足，不懂得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没有找出一条中国化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道路，因而在革命中受到了多次严重的挫折，经过了较长时期的痛苦的摸索阶段。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前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着一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我国当时的教条主义者，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长期性和曲折性，不正视在革命开始阶段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盲目主张武装攻打大城市和进行中心城市武装起义；无视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和农民占绝大多数的特点，低估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决定作用，低估甚至否定农民游击战争和建立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超越革命阶段，提出了一些过左的政策。在我们党内一再出现过的这些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走了极其曲折的道路，甚至几乎陷于绝境。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经验作了理论概括，逐步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即毛泽东思想。从此，中国革命有了唯一正确的指导方针，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发展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关于革命斗争的战略和策略的理论，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以及表现在毛泽东同志全部科学著作和中国共产党人革命活动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都以独创性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的总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

毛泽东同志不但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根本理论问题，而且解决了决定中国革命发展前途的一系列重大实践问题。在中国人民争取民族民主解放的伟大斗争中，在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毛泽东同志依靠党与人民的集体智慧和力量，以他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远见卓识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才大略，驾驶着革命的航船，绕过了一处处的暗礁，度过了一次次的危机，克服了一重重的困难，夺取了一个个的胜利。

在中国人民受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和剥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接连遭到失败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积极在中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党的其他几位创始人一起，共同缔造了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使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在争取解放的道路上有了向导，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右派背叛了中国革命，再加党内存在着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领导，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被一巴掌打在血泊中。在中国革命面临夭折危险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同志继周恩来等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之后，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确定的正确方针，胜利地组织和发动了武装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找出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胜利之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发动的四次反革命“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造成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开始长

征。王明左倾错误所造成的严重恶果，使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都受到了极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此，中国革命“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党和红军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了下来，并且在这以后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越来越严重，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的历史转变时期，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当机立断、高瞻远瞩，正确地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推动蒋介石与我们党联合抗日，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打下了有力的基础。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政府撕毁和谈协议，破坏停战协定，依赖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妄图实现其扑灭革命力量的野心。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及时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正确方针，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进行了伟大的解放战争，仅用了三年多的时间，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和人民继续胜利前进。建立了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实现和巩固了除台湾等岛屿以外的全国范围的国家的统一，加强了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和国防建设，维护了祖国的独立、安全和尊严，完成了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并在共同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

的斗争中发展了与世界各国人民的联系和友谊。

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清楚地表明，毛泽东同志一次又一次地在中国革命的严重关头，把党和革命挽救过来，在革命的历史转折时期提出科学的创见，领导我们党作出战略性的决策。正因如此，我们党把自己的指导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并且把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当作神圣的任务；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把毛泽东同志当作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领袖和导师，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当作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从内心里崇敬他，永远地纪念他。

然而，我们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勋，并不是否认他同时存在着错误。如同很多站在历史潮流前面的伟大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和错误一样，在毛泽东同志的伟大一生中，也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主要是在他的晚年，由于长期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而过分相信自己，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党的集体领导的情况越来越严重，造成了许多失误，直至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全局性和长时间的严重错误，给党和人民带来了很大的不幸。毛泽东同志的这些错误，虽然只是支流，但和他的伟大成绩一样，也都是客观存在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几年来拨乱反正的伟大实践，经过传达、学习全会文件，对于干部群众重新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教育，人们的思想大解放，实事求是的精神大发扬，大多数人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功过问题上，在对待我们工作中的失误问题上，观点比较明确了。但是，在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问题上，也还有一部分人存在一些不正确

的认识和态度。从当前情况看，最需要我们注意克服的是下面两种错误倾向：

第一种错误倾向是，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抹煞他的历史功绩，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譬如，有少数在过去“左”的错误中受了一些挫折或打击的同志，经过平反之后仍有委屈情绪，不能历史地、全面地看待毛泽东同志的功过问题。他们把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看得过于严重，不承认毛泽东同志功大于过，甚至从个人恩怨出发，有意贬低毛泽东同志，把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看作是个人品质问题。有一部分青年人，因经历较少，对我们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了解不够，对毛泽东同志的光辉业绩感触不深。他们没有走过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的道路，没有尝过在旧中国劳动人民受尽侮辱、当牛做马的苦头，不懂得革命胜利来之不易。相反，他们却目睹了毛泽东同志在晚年犯错误的事实。由于这样，有的人就很容易以偏概全，片面夸大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上面所说的这两种人，主要是思想认识问题，而且在学习《决议》后一般能澄清糊涂观念，把思想统一到《决议》精神上来。对这些同志的思想认识问题，只能用说服教育的方法来加以解决。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我们党和军队的历史发展，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不否认毛泽东同志有错误，但是，和他的伟大的功绩比较起来，无论从时间、空间和对革

命事业的影响程度来看，这些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 error，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前进道路上出现的失误。他对人民的贡献是不朽的。如果把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说得过头，就会损害我们党和国家的形象，损害社会主义制度的威信，涣散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如果否定毛泽东同志，就是否定我们党的历史，否定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历史，否定我国革命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思想。这样做，必然要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错误。因此，我们一定要纠正那种片面夸大毛泽东同志错误的思想，在肯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问题上，坚定不移，不能有任何含糊。

但是，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确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他们利用我们党实事求是地评价过去的工作，纠正左倾错误，总结经验教训的机会，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尽量夸大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放肆地诋毁毛泽东思想，公开诽谤党中央领导同志，极力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甚至明目张胆地建立非法组织，出版非法刊物，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破坏社会安定和四化建设。这种人是政治立场问题。他们的言论与我们一些同志的糊涂思想在表面上虽有某些近似之处，但却是有原则区别的。他们的错误言行，与我们党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更是格格不入的。

我们不掩饰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否认我们党的工作中有失误。我们始终不渝地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检查纠正这些错误。但是，我们的这一切都是从提高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威信，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坚

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的。正象《决议》所表明的那样，我们既指出了毛泽东同志的严重错误，又充分肯定他的伟大功勋；既讲了他犯错误的主观原因，又分析了客观影响；既讲了毛泽东同志本人的过错，又讲了集体领导的责任。这样，功是功，过是过，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使人心悦诚服，并从中汲取了教训，增添了力量。列宁在1916年12月25日给印涅萨·阿尔曼德的信中，尖锐地指出：“恩格斯并不是完全没有错误的。马克思也不是完全没有错误的。但是，要指出他们的‘错误’，应当采取另一种态度，的确要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否则，您会犯一千次错误。”^①《决议》正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科学地阐明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一生的功过，作出了实事求是的、恰如其分的评价。这和那些以批判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为名，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之实的人，是截然不同的。因此，我们在贯彻《决议》精神，解决少数人存在的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态度时，一定要以《决议》为准绳，摆事实，讲道理，统一认识。要把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和根本立场上的错误严格区别开来，绝不能让那种别有用心的人从中混水摸鱼。

第二种错误倾向是，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否则，就是“砍旗”，就是“离经叛道”。他们不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在这方面最突出的就是那种所谓“两个凡

^①列宁：《给印涅萨·阿尔曼德》载《列宁全集》第35卷第256页。

是”的错误观点。推行这种错误观点的人，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主张“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如果照此下去，“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就不能纠正，我们工作中的“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就要继续坚持，一大批冤假错案就不能平反昭雪，这样做显然是不符合党的利益，不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的。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思想和林彪、“四人帮”反动思想的毒害，有些人却很容易受“两个凡是”的思想影响，对待毛泽东同志采取绝对肯定的态度。譬如，有的人没有弄清领袖是人不是神的道理，总认为“圣人”“贤者”应当是无过的，象毛泽东同志这样的伟大领袖人物，只能最英明、最正确，而不可能有什么错误。当我们党为了总结历史经验而指出和纠正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时，他们就觉得不好理解。另如，有的人受“忠君”思想的毒害，不能坚持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在这些同志思想上并不是没有认识到毛泽东同志有错误，而是以朴素的阶级感情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自己不愿承认，也不让别人承认毛泽东同志有错误。在他们看来，对革命领袖的过失，讳言就是天经地义的，批评就是极不应当的。这些同志没有牢记实事求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没有牢记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是我们党区别于其它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没有牢记毛泽东同志关于“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①的至理名言，因而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采取了“不承认主义”。再如，有一

^①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1217页。

部分人受“左”的思想影响，没有划清正确与错误的界限。有些事情，经过长时间的反复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东西，由于他们戴着“左”视眼镜看问题，就把错误当作正确，搞得是非颠倒。现在，有少数同志对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有些怀疑，在实行生产责任制、落实人的政策等方面动摇了，甚至情绪抵触，其根本原因就是他们还没有从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下解放出来。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世界上的人，只要干事情，就会有过失。“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①，“只有什么事也不干的人才不会犯错误”^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同志和我国的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从来没有一个人、在一篇文章中断定革命者是“万无一失”、永远不犯错误的，更没有夸耀说他们自己是永远不可能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多次指出，世界上的一切人，包括他自己在内，都有正确和错误这样的二重性，都是“一分为二”的。当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毛泽东同志受到全党、全军和各族人民的普遍爱戴与拥护，并且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公开申明，“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我这个人也犯过错误。一九二七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在经济问题上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以经济问题写错了。此外，在二

①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载《列宁选集》第4卷第192页。

②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载《列宁选集》第4卷第609页。